



熊宝海 年龄:82岁
心语:“开展思想工作,不能‘放空炮’。”

一生心血倾情基层宣教工作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您是余记者吧?今天过来采访我,我特别开心啊。”走进劳模熊宝海的家里,他热情地说。

出生于1934年的熊宝海,今年整整82岁了,他是土生土长的丰台花乡人。1950年,他高小毕业,参加了村里的扫盲运动,因为表现出色,他被丰台区政府任命为专业教师。后来又调回当时的汾庄村任村支书,虽然此后他先后在团委、党委等任职,但是,讲课伴随他一生。

讲课讲出了名堂

1950年,丰台区团委在汾庄村建立了一个团课传授站,附近村子的村干部经常会来这里听团课,对当时的熊宝海来说,这是个痛苦的事。原因很简单:他团课讲得不好!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是害羞不敢讲。

为了克服讲课紧张的毛病,每天晚上10点,等听课的人走了,他就面

对着田里的一堆砖头开讲:“同志们,注意了,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这个内容……”站在田野上,面对砖头,他不再紧张了。经过几个月的练习,在陌生人面前,他可以流畅地讲话了。同时,为了丰富内容,熊宝海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好的内容,他还会剪下来,贴到笔记本上。为了把课讲得动听,他还收集了一大堆“幽默小故事”以及“俏皮话”。

讲课内容丰富,语言幽默风趣,很快,熊宝海就讲团课出了名。这期间他被调回乡里担任副乡长,同时还主管党务、宣传工作。中央开的每次会议的解读和学习,党员培训,从乡里,再到村里,熊宝海都要一批批讲。每每这时,他都得“挑灯夜战”。

准备一杯茶、一盒烟,熊宝海就开始搜集素材,准备讲稿。晚上10点等家人睡下,熊宝海就开始写了,常常一准备就是一夜。讲稿写完了,他

睡两个小时,然后就去上班、讲课。这种工作节奏熊宝海一直坚持到退休,乡里、村里、企业、学校……听到他讲课的人数以万计。

平时喜欢画画和看书

1989年,东欧剧变,为了稳定党群,响应上级的号召,他开始讲社会主义教育,这一讲就是一年多,嗓子很多时候疼得都说不出话来,后来患上了慢性咽炎。在长期的高负荷工作下,他眼底出血,视力急剧下降。

“国际形势不稳,宣传教育跟不上,人心浮动,社会怎么稳定?经济怎么发展?作为基层的党群工作者,做好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再累都是值得的。”熊宝海感慨地说。

除了讲课,熊宝海还通过制作录像、开展五月鲜花、组织春节文艺汇演等多种方式丰富乡里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我们不发展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不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精神毒瘤’就可能影响百姓,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凭借着在思想宣传中的优异表现,1990年,熊宝海被评为北京市劳模。退休后,由于长期高负荷的工作,他的左眼逐渐失明了,右眼也仅有0.1-0.2的视力水平。熊宝海喜欢画画,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墙上挂着一些画作,有竹林、有牡丹,画得栩栩如生。“这都是我视力好的时候画的。”

熊宝海喜欢看报,有时会让女儿给他读报、读书,聊起过往的故事,熊宝海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他特别跟记者强调说:“开展思想工作,不能‘放空炮’,调查研究很重要,上面有文件,可是基层什么情况,一定要下去摸清楚,一定要知道大家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这样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时,才能事半功倍。”



刘少伯 年龄:87岁
心语:“建好托老所,让老人老有所养,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在牧区打井建澡堂发展加工业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要采访我?谈谈被评为劳模的经历和故事?好呀,你过来吧。”记者知道出生于1929年的刘少伯今年已87岁了,可没想到,打电话跟他约采访时,电话里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声音响亮,逻辑清晰。

如约来到中国农业大学教工宿舍,说明采访来意,刘少伯表达了感谢:还记得我,真好!然后就开始聊起来。他语言流畅,思维缜密,记者几乎不需要引导。

曾在藏区牧马放羊

1949年,刘少伯考入当时的北大农学院,1953年毕业后,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畜牧系任教,这一生,他再没离开过。1958年,师生被集体下放,刘少伯带队,一行70多人来到青海海南自治州。这里荒无人烟,狂风挟裹风沙,气温零下30度是常事,当地藏民住在原始的帐篷里,黑红的

脸上粘着一层黑泥,就露出一双眼睛。从大都市来到如此艰苦的地方,但在刘少伯的叙述中,没有表现出对艰辛的喟叹,他平静讲述了所经历的故事。

当地没有水,很快刘少伯从州里请来打井队,决定为当地藏民打一口井,并跟打井队协商,利用钻井时的部分热水,在当地建起了澡堂。他们到藏民家里,发动他们过来洗澡,藏民开心进了澡堂,出来后干干净净,脸上再无黑泥。

看到藏民很穷,刘少伯开始琢磨着发展一些工业。跟同事、学生们一合计,开办了几个加工厂,一个是食品厂,加工牛肉干;还有一个皮革加工厂和地毯厂,充分利用当地的动物皮毛。此外还成立了兽医站,为当地的马牛羊看病。当地的工业就在他的带动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利用我们的专长,尽力为当地牧民做点

事。”谈起这些,刘少伯轻描淡写。

半年后,刘少伯又被调到内蒙锡林郭勒盟。在那里,他主持了很多实验,像羊的多胎多产、马的人工授精等。“发现当地的羊一胎就生一只,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它多生几只?”在刘少伯主导实验后,当地一只羊最多时能生7只。

提议社会建好托老所

1961年,他被通知去市里开会。去了后才知道是“劳模会”,领了证书,给了荣誉。回来后,刘少伯一如既往投入了教学中。“我们那个时代对荣誉看得没那么重,就觉得该把自己负责的活干好,这都是本职。所以后来我一直没有获得劳模荣誉的那种激动。”刘少伯淡淡地说。退休后,刘少伯又被返聘回学校。

聊完那段跟被评为劳模最接近的“下放”故事,刘少伯原先平淡的神情

已被点燃了,“你是记者,我特别想跟你们反映下我对一些热点问题的看法。”他说话的音调开始升高,手势增多。

刘少伯说,在他们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对鼓励生育的政策是有质疑的,陈寅恪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建议:一定要控制人口。事实证明了计划生育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目前中国老年人越来越多的事实,他认为应该建好养老院,建好托老所。

“人类的两头,一定要集体化,你看,咱们的托儿所不是开展得很好吗?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建好托老所,让老人老有所养,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和谐,文明程度也才会更高。”刘少伯声音提高了,语速也快了。他那种关心国家大事的姿态,很有知识分子的风采。